

# The Failure of Empathy and the Power of Art: An Eth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ossible Other

—Take Kimsooja's "A Needle Woman" as an example

HUANG He<sup>1</sup>; LIU Chang<sup>2</sup>

1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Chuncheon, 24341, Republic of Korea

2 Qi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ing, 810000, China

## ABSTRACT

**[Background]** Empath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of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 is both a key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ethical pursuit. The dilemma of empathy in real situations provide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rtistic expression, for art does not evade the distance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the failure of empathy, but rather transforms this distance in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Objective]** This study situates the “impossible possibility” of forgiveness and empathy within the essence of ethical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empathy in ethical contexts. Through the sensuous experience of art, it demonstrates how artistic works can transcend the barriers of incommunicability,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the Other,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ethical power of empathy in aesthetic experience.

**[Method]**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using Kimsooja's "A Needle Woman" as the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unempathetic empathy that is evoked by artistic works.

**[Results]** Empathy is not a homogeneous project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but rather, within the aesthetic realm of art, through the acceptance and reflection of what cannot be empathized with, it awakens the subject's awareness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self-perception.

**[Conclusion]** The value of empathy lies not in eliminating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unreachable others. Through the active recognition of the incommensurable in artistic works, the subjec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elf-awareness and ultimately constructs a more ethically significant empathic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Keywords:** Empathy; Forgiveness; the Other; "A Needle Woman"

**ORCID:** 0009-0006-6527-7395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Chang; 401798496@qq.com

**DOI:** 10.23112/jgas25093011

**Received:** 15. Jul. 2025

**Reviewed:** 05. Aug. 2025

**Accepted:** 30. Sep. 2025

# 共情的失败与艺术的力量：与抵达不可能他者的伦理关系

——以 *Kimsooja* 《A Needle Woman》为例

黄和<sup>1</sup>；刘畅<sup>2</sup>

1 国立江原大学，春川，24341，韩国

2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西宁，810000，中国

## 摘要

**【背景】** 共情作为一个多维度讨论的跨学科概念，是关键的心理现象，也是伦理追求的最终实现。在现实情境中的共情困境提供了艺术表达的起始，因为艺术不回避在共情失败中自我与他者存在的距离，反而将这种距离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起点。

**【目的】** 将宽恕的不可能之可能与共情置于伦理关系的本质中，讨论在伦理情境中共情的可能。以艺术作品的官体体验为媒介，展示在看似不可能共情的情况下，艺术作品如何打破无法共情的障碍，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最终在艺术体验中实现共情的伦理力量。

**【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 *Kimsooja* 的行为艺术作品《A Needle Woman》为案例，探讨艺术作品所引发的不可共情的共情。

**【结果】** 共情并非对他者经验的同质化投射，而是在艺术的审美场域中，通过对不可共情的接纳与反思，唤醒主体对自我认知局限的觉察。

**【结论】** 共情的价值不在于消解不可抵达的他者的伦理困境，通过艺术作品中对共情困境的主动体认，主体超越自我认知的有限性，最终构建起与他者之间更具伦理意义的共情关系。

**关键词：** 共情；宽恕；他者；《A Needle Woman》

ORCID:0009-0006-6527-7395

通讯作者：刘畅；401798496@qq.com

DOI: 10.23112/jgas25093011

Received: 15. Jul. 2025

Reviewed: 05. Aug. 2025

Accepted: 30. Sep. 2025

## 1 引言

正如普遍理解的那样，共情能力是指我们把握和理解他人心理与情感生活的能力。它被不同程度地视为一种可培养的技能、一种天赋或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并被认为具有心理和道德属性。共情不仅引发了诸多学术热点，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共情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被广泛提倡。共情(empathy)作为令人瞩目的跨学科概念之一，最初的含义是将个人情感投射到物体形态和形状中的审美活动上，这一理解源自德国美学传统中的“内在感受(Einfühlung)”概念。1873年，德国哲学家费舍尔(又译“费肖尔”)首次明确界定“内在感受”的含义。1909年，旅居美国的英国心理学家铁钦纳将内在感受”译成“共情(empathy)(Burton, 2015)，并迅速获得学界的广泛接受。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各种不同形式的共情理论主宰了整个西方美学界，其影响力直至二战爆发后才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伴随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共情概念开始在心理学、精神分析、生物学、进化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在神经科学领域，共情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包括情感共鸣或情感感染、运动模仿、复杂的认知与想象能力、观点采择、动觉建模、镜像神经元的激活等；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涉及文化与政治中的共情研究，包括大众共情、共情与种族与政治关联等(Lanzoni, 2018)。这些研究囊括对共情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和社会制度文化等外在影响因素与共情的相互作用研究。自“共情”一词诞生以来，共情实践已渗透至众多领域，从审美心理学到社会工作与心理治疗，再到政治、广告及媒体。尽管这些实践形式各异，但它们均表明，将思想、情感、自我及身体动作延伸至他人与物体，长期以来被视为可行。

对当下社会是否变得更加富有共情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事实上，在当前社会政治环境下，随着仇恨犯罪、偏激言论和种族主义的急剧上升，忽视他人的存在和感受、无法给予个体足够尊重等问题正如雾霾般悄然笼罩整个社会，共情的缺失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艺术可以通过艺术语言的方式去描写与表达，通过艺术作品去描写与表述非艺术领域不可描写与表述的东西。面对艺术作品通过感性去体验是行走在感性的路径上，而面对体验来分析感性则是返回到理性的论域(韩, 2024)并非只有逻辑语言能够清晰阐述的事物才能被真正感知，它无力触及的领域正是艺术表达的起始之处。阿多诺认为哲学的深层意图，必须借助于艺术来展示，艺术表达了哲学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张, 2015)，在他看来，艺术已不再像传统那样凭借现实的日常媒体去表现，而是超越了现实的日常媒体。直接去反思被日常现实挤到一边去的真实和实质性存在(朱, 1997)。



图 1: A Needle Woman, 1999

图片来源: [https://k-artist.com/Artist\\_Works.php?tab\\_num=tab4&artist\\_num=50&works\\_num=1984](https://k-artist.com/Artist_Works.php?tab_num=tab4&artist_num=50&works_num=1984)

艺术家 Kimsooja 的艺术作品《A Needle Woman》通过行为录像的艺术表达，引发对共情中自我与两者存在的思考。《A Needle Woman》是韩国艺术家 Kimsooja 的视频作品展览，结合表演、视频和装置，

探讨流离失所的自我问题。人们从静止不动站在城市中央的 Kimsooja 身边走过，人们匆匆瞥过她，有时身体还会与她发生碰撞。艺术家背对着观众站在屏幕中央一动不动的背影，她的长发整齐地扎成马尾辫，没人知道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她不发声、不移动、不表达任何显性情绪。作为观者的你是怎样的感受？你是否有一丝的好奇、不安、同情或只是漠然？作品中艺术家沉默的在场，恰如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缩影，既渴望被看见，又难以被理解，她的无声姿态挑战观者的内心，Kimsooja 的艺术实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社会共情的缺失，也是对重建共情的迫切呼吁。本文将共情置于德里达宽恕的伦理语境中，通过艺术作品的分析，探讨艺术作品所引发的共情：共情应该是对抵达不可能他者的共情。

## 2 作为“不可能”的“可能”：德里达的宽恕论

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如果一种罪行可以轻易被“补救”与“原谅”，这是人们永远都可能做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宽恕不能出于“同情”，不能出于“交换”，也不能出于特定“目的”，因而属于“不可能”的绝境性体验。但宽恕的“不可能”中蕴含着“可能”，他者的“相异性”是其得以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人类正是经由宽恕，方能实现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并获得自身的最终解脱。在此意义上，“解构”并非“摧毁”了宽恕，而恰恰是对宽恕的“建构”。1999年12月德里达接受了法国《论坛报》的专访，指出宽恕的真正本质是无条件的，即“宽恕不可宽恕的”；如果只能宽恕可以宽恕的，就意味着宽恕变得有条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宽恕。2001年9月德里达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演讲，指出宽恕概念中存在着悖论性因素，宽恕乃是摇摆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绝境性”体验。西方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两种宽恕传统。一种是有条件的宽恕，另外一种是无条件的宽恕。德里达认为这两种逻辑共同存在于传统之中，只不过前者比较明显，后者比较含蓄而已。宽恕的有条件性与无条件性之间相互矛盾，又共同存在于宽恕概念之中。德里达通过对宽恕概念的分析，试图揭示其隐含的内在矛盾性，从而表明解构的运作并非外在于概念本身，而是概念本身的某种“自我解构”。

西方文化语境中存在着两种宽恕传统。一种是有条件的宽恕，另外一种是无条件的宽恕（杜、张，2003）。在德里达看来，如果一个行为可以被轻易“补救”与“原谅”，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做到的，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宽恕。真正的宽恕应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德里达，2002），而这又超出了普通的逻辑，使宽恕成为了“不可能”。德里达宽恕的不可能性源于罪行的他异性，即罪行作为一种极端事件，无法被同化或还原为任何理性框架。他者（罪犯或受害者）的立场是绝对独特的，无法被完全理解或补偿。尽管宽恕不可能，但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恰恰存在于这种不可能性中，它是一种无条件的、不期望回报的举动，甚至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物。这种宽恕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伦理姿态，指向超越。

## 3 解构“不可能”的共情：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张力

共情（Empathy）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黏合剂，可以定义为某人能够识别和感受他人、虚拟角色或情感生物的情感的能力。共情涉及两个方面：（1）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他人的处境；（2）与他人感同身受，包括感受其悲伤。并且必须进一步深入，把自己想象成对方，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想象自己正处于对方所在的处境，想象自己是她（Burton, 2015）。其生成机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我们如何从自我出发，走向他者的心灵世界？共情通常被认为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要求我们努力去理解他人在想什么或感受什么，有时我们通过角色扮演来做到这一点，即“假如我是你”这种思维方式。共情的不可能性源于对他者经验的不可还原性，他者的内心世界总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保持其神秘性。

当我们凝视 Kimsooja 的装置艺术作品《A Needle Woman》时，她身着朴素的服装，静静地立于城市各处，任由无数路人从身旁穿梭，却始终不作任何肢体反应，她的身体仿佛一枚针，将观众对艺术家的理解切割、刺破。初见时，我们或许会因艺术家的孤立无援而心生同情，产生瞬时的情感回响。然而随

着我们注视的延续，我们不得不思考：她为何静默？这种静默本身是否在反问现代城市中的疏离与难以触及？当我们不断在脑海中重现她的身影，试图用自身经验去填补艺术家未曾言说的内心。共情需要我们超越表面，深入到他者的精神世界中，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感受。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经验的局限，放下“必须完全理解”的执念，才能为跨越自我中心的共情打开新的可能，这种对自我经验局限性的承认。

共情不能出于“同情”。“同情”乃是“同一性”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自我”将“他者”纳入自身，从而建立起双方的认同；虽然我进入了对方的角色，也在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但以我为前提的认同化过程不是共情本身。只有当我面对某个我根本不了解、离我无比遥远，而且我无法认同于他、他也无法认同于我（苏，2017），宽恕才是可能。共情也是如此，它只能是一种“相异性”的经验而不能是“同情”。事实上，“他者”作为异质性存在，是“自我”永远不能通达之地，永远不可能被自我化约为“同一”。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有着神秘的深渊，自身经验中无法还原的东西正是朝向他者的通道和出口。他者只有在其相异性绝对地、无限地不可还原的情况下才是他者（Derrida, 2001）。无限“他者”是任何概念都束缚不了的，不能被置于任何“同一”的视域中加以思考，因为在同一视域这种根本统一体中，所有的突变、所有的意外总是被纳入某种理解和认可（苏，2017）。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不可移植的差异，是一种“极端相异性”的经验。德里达指出：要想有宽恕就必须有绝对的、不可移植的差异，这可能使得宽恕不可能（张，2004）。如果“他者”被纳入了自我的同一性，只不过表明双方建立了“同情”，但这也意味着共情的停止。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笔者认为共情不能是“分享”他者的情感，而是超出了“同情”、“理解”“认同”等“同一性”的运动。

宽恕那些本来不可宽恕之人或事，意味着宽恕乃是“不可能”的经验，应该被视为不可能本身，它可能做的是不可能（Derrida, 2001）。这种“不可能”的因素，内在于宽恕概念之中，体现了一种“自我解构”。传统哲学始终将他者视为待征服或同化的对象，共情会沦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工具，我们不是在理解他者，而是在复制自我。若共情被主体的某种认知框架或结构所主导来理解和同化他人的经验，反而变成了一种对他者的压迫或伤害，这种统摄可能忽略了他人独特的、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将他人的情感和体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解体系中，从而造成共情的暴力，这里的暴力不是物理上的，而是象征性的、情感认知上的，自我忽视他人情绪感受的独特性或者用自身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他者的面孔永远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言说”，即便我们试图通过语言或想象去描绘，也难以完全还原其独特的生命经验。只有在尊重这种差异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迈出共情的脚步。通过接纳他者的不可言说，我们不再将共情视为自我经验的延伸，而是把它当作通向伦理责任的桥梁。宽恕之不可能与共情之不可能都基于列维纳斯等哲学家所强调的“他者”理论，他者总是超越自我，无法被完全吸纳或理解。这种他异性要求我们以谦卑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他者，而不是试图征服或同化。《A Needle Woman》在进行这样一个尝试，艺术家代表了他者的不可化约性，当观众试图用个人经验填补艺术家的静默时，遭遇了情绪与认知失效，这种失效揭示了共情深处的悖论：试图理解他者，却无法完全抵达。艺术家与观众间的张力，正是共情悖论的具象化。观众在静默中感受到自我与他者的绝对距离，正是对他者绝对差异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促使我们反思，真正的共情并非消弭界限，而是承认并尊重他者的不可言说，从而在伦理实践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共存。艺术家用象征性的针刺破了观众自我中心的共情幻象，观者需要意识到真正的共情需跨越自我中性的边界，去接纳他者的独特性。

尽管宽恕不可能，但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恰恰存在于这种不可能性中，它是一种无条件的、不期望回报的举动，甚至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物。这种宽恕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伦理姿态，指向超越。同样，尽管共情不可能，但伦理要求我们不断尝试去理解他者，即使知道会失败。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就如同在艺术欣赏中，观者虽无法完全理解艺术家，但仍通过想象和对话逼近共情。两者都涉及一种“悖论式的伦理”，在不可能的条件下，我们才被召唤行动，宽恕和共情都不是可达成的状态，而是持续的过程，强调行动而非结果。

## 4 重构“可能”的共情

德里达认为，宽恕的可能性正是在它的不可能性当中。宽恕只在在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宽恕不可宽恕的罪恶的地方才能获得意义和宽恕的可能性（杜、张宁，2003）。德里达说宽恕乃是一种“极端相异性”的经验，只有当我面对某个我根本不了解、离我无比遥远，而且我无法认同于他、他也无法认同于我的人时，宽恕才是可能的——与宽恕的不可能性恰恰自相矛盾的是宽恕变成可能的因素（Derrida, 2001）。那么，共情的“可能”是如何发生的呢？德里达将“不可能性”视为“可能性”的宽恕的意义仅在“宽恕不可宽恕者”中生成，共情的可能亦需始于对“共情不可能共情”的直面，也唯有打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幻象，承认他者的“极端相异性”，在觉察自我有限性的反思中，方能重构超越“自我同一化”的共情伦理。

Kimsooja 的行为艺术作品《A Needle Woman》恰以具象的艺术实践，将这一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为“重构可能的共情”提供了生动注脚。作品最核心的伦理意涵，在于以“静止的他者”姿态瓦解共情的同一性预设。Kimsooja 以垂直站立的“针”为固定姿态，置身上海、纽约、东京、德里、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的公共空间，她不与环境互动，不传递明确的情感信号，甚至不显露面部表情，仅以“被动在场”的方式成为公共场域中的异质符号。这种呈现方式直指德里达所言的“延异”运动。观者试图将艺术家纳入“可理解的共情框架”，像是孤独的异乡人、抑或坚定的行为者，但却被不断打破预期，艺术家身体的静止似与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与市井活力脱节相悖，而艺术家自始至终的沉默更显出与不同文化语境的隔阂，环境的“他者性”与艺术家的“中立性”相互作用，持续推迟共情对象的“同一化”，最终瓦解了观者以自我经验投射他者的认知惯性，迫使观者直面一个根本事实：艺术家的处境无法被单一的“自我视角”所覆盖，他者的“相异性”始终超越自我理解的边界。这种“共情的不可能性”，恰是重构共情的本体论起点，正如德里达所言，唯有承认他者“不可被同一化”，才能敞开共情的“未来可能性”。

更进一步，作品通过迫使观者反思自我有限性，将共情的“不可能性”转化为伦理实践的可能性。艺术家 Kimsooja 在艺术行为中的“不回应”，彻底切断了观者通过艺术家的反馈确认共情有效性的路径，即观者无法从艺术家的姿态甚至表情中获得“我的理解是否正确”的答案，只能转而审视自身的认知局限，为何会预设她是孤独的？或者猜测她的陌生，这种预设和猜测是否源于自身对跨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这种反思直指德里达理论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绝对距离。观者可能逐渐意识到，共情的障碍并非源于不够努力去理解，而是源于试图以自我经验同化他者的认知偏差，当面对根本不了解、无法认同的他者时，共情的伦理才真正显现。当观者可能因语言与文化差异很难对艺术家产生共情，但正是这样，才能促使大家放下自我中心的预设，转而倾听更广阔的他者的声音，比如汽车行驶而过、周围行色匆匆的路人、街边玩耍的孩子、路边商店传来的音乐等等，这些原本被忽略的环境他者，此刻成为理解艺术家处境的重要维度。观者不再强我要懂她，而是开始关注她所处的他者场域，这种从投射自我到尊重差异的转变，正是重构后的共情核心，共情不再是对他者经验的复制，而是对他者存在的承认。承认自我的有限和局限，在亲近“他者”时才能有对“他者”的无限责任，对他者的无限责任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伦理实践。哲学的任务是去倾听“他者”的声音，去关注那些“他者”的相异性的存在。“他者”的相异性构成了共情中的悖论性因素，但这恰恰是共情得以可能的前提，也只有在“他者”的相异性运动中，才能显现出共情的真正意义。共情不是朝向“自我同一化”的运动，而是承认了“绝对他者”的相异性，即是打开了朝向他者的无限视域，乃是对封闭的、有限的自我的超越。

综上，德里达的“宽恕”和文章中的“共情”虽然应用场景不同，但共享一个核心逻辑。它们都基于“不可能性”来定义伦理关系的本质。这种不可能性不是绝望的，而是激励我们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对待他者。在宽恕中，我们面对罪行的不可补救性却仍坚持宽恕的姿态；在共情中，我们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却仍努力理解。因此，它们的关联在于共同揭示了伦理的极限体验，以及在这种极限中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尝试。《A Needle Woman》以艺术实践印证了德里达的伦理命题。共情的可能不在消除不可能性，而是在不可能中发掘联结。共情不再追求完全理解他者的虚幻目标，而是以承认无法完全理解为起点，在持续关注、反思与尊重中，实现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这种重构后的共情，恰是德里达所期待的“朝向他者的永恒运动（龚，2017）”。

## 5 结论

文章探讨了当共情因他者的绝对差异性陷入不可能的伦理困境时，艺术如何构建与他者的联结。研究表明，共情作为哲学、心理学与伦理学交叉领域的核心概念，共情失败并非源于功能缺失，而是源于对共情同质化投射的认知偏差，当人们试图以自我经验复刻他者感受、消除自我与他者的距离时，必然会遭遇认知鸿沟。而艺术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打破这一认知鸿沟，艺术将共情失败作为表达的起点，不回避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反而将这种差异转化为审美体验的核心。以感性体验重构共情的内涵与边界。

Kimsooja 的《A Needle Woman》艺术作品中，艺术家以静止的针的姿态置身全球不同城市的公共空间，既不主动传递情感信号，也不迎合观者的解读期待，这种绝对的他者迫使观者直面自身与艺术家的距离，正是在这种对不可共情的主动体认中，观者得以跳出自我中心的认知框架，觉察到自身经验的有限性，而这恰是共情伦理关系的真正起点。

文章结合德里达宽恕论中“不可能之可能性”的理论，进一步阐述艺术引发的共情的伦理意义不在于实现完全的共情，而是在不可能中发掘可能，引导主体在艺术体验中不追求消除他者的差异性，而是接纳他者的差异性。通过艺术的中介作用，重构共情的内涵，不是对他者经验的复制，而是实现对自我认知局限的超越，最终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更具伦理的共情关系。

本文主要通过艺术作品分析展开对共情的讨论，而宏观的社会因素如政策教育体系等如何促进共情、社会结构对个体共情能力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调整宏观社会因素来提升社会整体的共情水平，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 参考文献

- Burton, N. L. (2015). Heaven and hell: The psychology of the emotions. Acheron Press.  
URL:[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allintitle:+Heaven+and+hell+The+psychology+of+the+emotions&hl=zh-CN&as\\_sdt=0,5](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allintitle:+Heaven+and+hell+The+psychology+of+the+emotions&hl=zh-CN&as_sdt=0,5)
- Lanzoni,S.(2018).Empath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  
URL:[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Empathy%3A+A+history&btnG=](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Empathy%3A+A+history&btnG=)
- Derrida, J. (2001). Writing and difference. Routledge.  
URL:[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writing+and+difference&btnG=](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writing+and+difference&btnG=)
- 韩锺恩.(2024).寻求音乐美学学术研究的新质结构力.音乐研究,(6),28-38+45.  
DOI:10.3969/j.issn.0512-7939.2024.06.004
- 苏仲乐.(2017).政治与友谊：德里达访谈录（上）.长安学术,(2),158-171.  
DOI:10.3969/j.issn.1673-7059.2017.02.024
- 张科晓.(2015).艺术真理问题视域中的海德格尔与阿多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6(4),30-35.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5.04.006
- 朱立元.(1997).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URL:[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5%AD%A6%E6%B4%BE%E7%BE%8E%E5%AD%A6%E6%80%9D%E6%83%B3%E8%AE%BA%E7%A8%BF&hl=zh-CN&as\\_sdt=0%2C5&as\\_ylo=1997&as\\_yhi=1997](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E6%B3%95%E5%85%B0%E5%85%8B%E7%A6%8F%E5%AD%A6%E6%B4%BE%E7%BE%8E%E5%AD%A6%E6%80%9D%E6%83%B3%E8%AE%BA%E7%A8%BF&hl=zh-CN&as_sdt=0%2C5&as_ylo=1997&as_yhi=1997)
- 杜小真、张宁.(2003).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URL:[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E5%BE%B7%E9%87%8C%E8%BE%BE%E4%B8%AD%E5%9B%BD%E8%AE%B2%E6%BC%94%E5%BD%95&btnG=&lr=lang\\_zh-CN%7Clang\\_zh-TW#](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as_sdt=0%2C5&q=%E5%BE%B7%E9%87%8C%E8%BE%BE%E4%B8%AD%E5%9B%BD%E8%AE%B2%E6%BC%94%E5%BD%95&btnG=&lr=lang_zh-CN%7Clang_zh-TW#)
- 德里达.(2002).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中信出版社.  
URL:<https://zh.annas-archive.org/md5/5d46487132a9330782bf1931655ffbe4>
- 张宁.(2004).德里达的遗产.读书,(12),65-72.  
DOI:CNKI:SUN:DSZZ.0.2004-12-005.
- 龚晓康.(2017).德里达论宽恕：作为“不可能”的“可能”.现代哲学,(5),71-77.  
DOI:10.3969/j.issn.1000-7660.2017.05.010

**免责声明：**所有出版物中包含的声明、观点和数据仅代表个人作者和贡献者，而非 JGAS 和/或编辑。JGAS 和/或编辑对因内容中提及的任何想法、方法、说明或产品而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